

跨国对话

公共外交 的智慧

The Wisdom of Public Diplomacy

赵启正等◎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跨国对话

公共外交

的

智慧

The Wisdom of Public Diplomacy

赵启正等◎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国对话 : 公共外交的智慧 / 赵启正等著 .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 2012.3
ISBN 978-7-5104-2558-5

I . ①跨… II . ①赵… III . ①外交理论 IV . ①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4578 号

跨国对话：公共外交的智慧

作 者：赵启正等
责任编辑：钟振奋 葛文聪
装帧设计：久品轩
图片提供：周晓烨 朱承铭 杨丹等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 5424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 5968 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http://www.nwp.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 刷：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1/16
字 数：150 千字 印 张：17.25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2558-5
定 价：36.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鸣 谢

中国外文出版事业局周明伟局长、黄友义副局长和新世界出版社总编张海鸥对成书的全过程给予了大力帮助；新世界出版社编审钟振奋和她的几位同事参加了本书的大部分现场对话，所以经他们编辑的文本不仅忠于原意，而且体现了生动的现场感；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办公室的荆文煌局长、周晓烨巡视员和喻中春、王强、王仲森先生参与了所有重要会见的安排；刘永鑫、朱承铭先生参与了全部对话活动，并协助记录和拍照；还得感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黄星原先生、驻美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尤雪云、袁艳春、乐利文参赞，以及现场的各位翻译。不言而喻，所有的对话者都是本书的贡献者，他们慷慨地让大家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智慧。

赵启正

2012年1月19日

序 言

传统的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对其他国家公众所开展的，旨在提升本国形象或声誉的活动。进入 21 世纪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间相互影响和依赖的程度加深，加之某些国际特殊事态，许多国家把公共外交进一步提升为全球战略布局之重要一环，使得公共外交的重要性骤然提高。如美国于 1999 年便设立了“公共外交副国务卿”的职位，英国也于 2002 年设立了类似职位。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使自己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发生的事情往往成为世界的事情，世界也成为了中国发展不可回避的边界条件。但在此前，中国一直和世界有某种隔绝，外部世界对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感到陌生，甚至有些神秘感，致使世界对中国的较全面理解尚需时日。加之冷战思维的残余，影响了西方政治力量和媒体对中国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的观察和评论，以致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形象与她的实情严重不符。这种背景提升了中国加强公共外交事业的迫切性。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是近年来中国举行的标志性公共外交活动；从 2004 年至今，中国教育部和国家汉办在 105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358 所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中国外交部在 2010 年 5 月成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2011 年以来，上海、天津、广东等国际往来密切的省市相继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2010 年年初，中国首个专门研究与讨论公共外交问题的杂志《公共外交季刊》创刊，受到了广泛欢迎；最近几年，以公共外交为主题

的研讨会也十分活跃。追溯起来，1949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则是中国第一个从事人民外交的社会团体（“人民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内涵基本相同，当时“公共外交”一词尚未流行）。虽然如此，中国的公共外交与欧美许多国家甚或有的亚洲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公共外交的实践活动与理论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公共外交的内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却有所不同。对此，相关著作有明显的滞后性，相关的杂志种类也较少。为及时调研相关的发展情况，我在去年设置了许多与世界各国在公共外交理论、实践方面颇有创见的资深人士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在广泛的交流中，我发现大家几乎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从事公共外交需要学习基本的专业知识，但其理论并不具有艰深的学术性；而公共外交的实践需要高度的智慧。政府的相关政策、项目规划和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外交活动设计、实施都需要广泛的跨文化知识和创新性的沟通艺术，并且还要对公共外交活动的效果进行及时的评估，从而不断地修正实施办法。

擅长同时出版中英文姐妹版图书的新世界出版社积极参与了近一年由我主谈的有关公共外交主题的国际对话，花费了不少力量整理录音，及时出版了这本《跨国对话：公共外交的智慧》中文版（英文版将在一个月内出版）。读者会从中发现，与经济全球化几乎同时高速发展的互联网和卫星电视使地球变小，各国公众在日益密切的国际交往中也越加关注本国的国际声誉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因此，当代各国的公众不只是公共外交的“受众”，他们也成为了积极参与公共外交的“主体”；这包括民间的经济、文化、教育、科学、传媒、体育、艺术、宗教等各种界别的社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政府公共外交的重点首先在于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的内外政策；而民间所承担的公共外交则较少使用政治和社会科学的术语，

他们表达的自己的故事更易于被外国公众甚或外国政府所理解。这样，各国政府的公共外交和民间的公共外交形成了互补之态。不言而喻，各国政府都乐意看到民间的公共外交的成长，亦会承认后者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成效。

公共外交实际上属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文明的不同表现在价值观、信仰、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由于文明差异的存在，才有了文明对话的需要。当不同文明之间缺乏足够的对话或者对话不对称时，则有可能产生重大的误解乃至冲突。中国的公共外交力求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共同繁荣。任何人都应当充分认识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和谐共处是人类的唯一出路。

中国在公共外交的践行中，不断积累新知遂成比较可靠的系统知识，并逐渐上升为理论。拙作《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2011年出版后，于同年在东京出版了日文版，书名被更改为《中国的公共外交》，这对外国读者来说是恰当的，因为此书以中国公共外交的相关理念和概况为主要内容，其中关于跨文化问题的阐述，也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相关思考。由于各国公共外交的理念和实践在随时地发展，希望读者从本书中比较当代一些国家公共外交的异同。

赵启正

2012年1月19日

目 录

Contents

说明今天的中国最重要 (2010年9月22日在北京与美国公共外交高级顾问保罗·福迪会谈)	001
白求恩的贡献有公共外交的效果 (2010年12月3日在北京与加拿大驻华使馆公共外交参赞麦道伟会谈)	023
中国和外界沟通需克服多种障碍 (2010年12月3日在北京与英国华誉传媒公司总裁沙学文会谈)	035
新亚洲的和平与繁荣 (2011年5月28日在济州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047
中国不认为有 G2 这种事情 (2011年5月29日在济州与韩国公共外交专家座谈)	053
中国的 GDP 是靠流汗和加班得来的 (2011年6月2日在纽约与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会谈)	061
越是敏感的问题，越是有回答的必要 (2011年6月2日在纽约与《纽约时报》负责人座谈)	071
二轨外交是公共外交的一种重要方式 (2011年6月3日与耶鲁大学副校长兼校务卿琳达·洛里默等座谈)	081
与其说公共外交是一门科学，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方法或战术 (2011年6月3日与哈佛大学学者座谈)	097

美国的公共广播和商业广播有很大的区别 (2011年6月6日在华盛顿与美国广播协会主席、前参议员戈登·史密斯会谈)	111
残余的冷战思维，不是进步的思维 (2011年6月6日在华盛顿与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卢格等座谈)	121
公共外交应当对政府外交的细节作补充 (2011年6月6日在华盛顿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会谈)	129
发现差异，互相学习才更有意义 (2011年6月6日在华盛顿与子午线国际中心专家座谈)	135
和记者交谈是我的一个乐趣 (2011年6月6日在华盛顿与《华盛顿邮报》负责人座谈)	147
中国为什么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 (2011年6月6日在华盛顿与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会谈)	157
中国的对外表达还没有形成一种常规的模式 (2011年6月7日在华盛顿与美国参议员马克·柯克会谈)	169
中国并不隐瞒自己的问题 (2011年6月8日在洛杉矶世界事务委员会演讲并答记者问)	175
改善中美关系对世界的进步是一种推动力量 (2011年6月8日在洛杉矶与南加州大学学者座谈)	181
中国有两件“华丽的外衣”，一件是奥运会，一件是世博会 (2011年10月12日在北京“全球化时代的公共外交”研讨会上与中外专家座谈)	199
双方直接认识可以缩短地理距离 (2011年11月19日在上海与巴西驻上海副总领事若埃尔·桑帕约会谈)	243
公共外交不是整容术，而是表达一个人真正的面孔 (2011年12月2日在东京与日本公共外交人士座谈)	251

说明今天的中国最重要

(2010年9月22日在北京与美国公共外交高级顾问
保罗·福迪会谈)



与保罗·福迪会谈后留影

对话人：赵启正 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

保罗·福迪 美国公共外交高级顾问

赵启正（以下简称赵）：很高兴见到你。你感兴趣的问题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没有任何问题是不可以问的，我都会回答你。当然，我也会问你一些问题。

保罗·福迪（Paul Foldi，以下简称福）：您今天有多少时间？因为我知道您很忙，而今天又是假期。

赵：到你感觉到累的时候。

福：如果没有限制的话，我们可以连续谈很多天，因为有那么多话题可谈。

赵：有过这样的先例，我和美国的朋友曾经谈过几天，包括你们的神学家、你们的作家，我都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们的谈话记录都出了书，并且在美国和中国都销得很好，一会儿我可以送给你。我出版的书有一部分出了外文版，也都是属于公共外交领域的。

福：由于我关注的领域以及我所从事的研究主要是公共外交，我注意到，中国对公共外交有着强烈的兴趣。现在我想了解一下，目前中国在公共外交领域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赵：公共外交有两种类型，一是A国政府对B国公众的，这是传统的公共外交。例如你们的美国之音。实际上公共外交的目的是让

对方的国民对本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近几年，中国的公共外交有很大的发展，我所在的部门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公共外交。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不能只靠对外传播。对外传播只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首先，中国是一个好的国家，是一个优秀的国家，这才是使外国人建立对中国的好印象的基础。中国的困难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得比较晚，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国际舆论中所描述的中国与真实的中国相比，失真很大。所以我们对外的表达不是说中国不是什么什么，而是要说我们是谁。

福：那么您想向其他国家的公众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说明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赵：要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也是很复杂的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是不断进步的国家。

福：您刚才提到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这听上去似乎在说中国人认为其他国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简单的国家。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认为外界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他们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怎样简单的国家？因为您是做公共外交工作的，所以首先您要搞清楚别的国家是如何看待您的国家的。如果其他国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您就要试图施加影响，消除他们的误解。所以我想问的是，中国是如何来评估其他国家对中国看法的？

赵：我本人每天要看两次国际主要媒体关于中国的新闻和评论，其中大量的来自美国的，因此西方国家如何看待中国，我了如指掌。简单地说，西方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敏感或者是意识形态的障碍使得他们不能正确认识今日的中国。他们还在想着原来的苏联，觉得中国和苏联差不多吧，这样来观察中国。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巴西、印度，可能没有问题；但发生在中国，这些事情就会受到严厉的批判，甚至攻击。不只是美国，西方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有这种倾向，只是轻重

不同。

福：我再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比如，中国又是如何看待美国的呢？

赵：我有一本书^①，专门谈对你们的看法。但那是10年前写的，现在还要增加一些看法。

福：10年前中国是如何看待美国的？现在又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

赵：中国人很喜欢美国人，因为他们很直率，乐于助人，也很有幽默感。这一点和中国人是很相近的。美国人的创造性，如阿波罗登月、信息技术，美国人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不断改进的民族的相容性都是中国人喜欢的特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帮过中国，这一点中国人一直没有忘记。

福：就美国的国际形象而言，公共外交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希望美国在外国人的脑海中浮现出什么样的形象？是一个骑在马背上的牛仔形象，还是一个宇航员的形象？还是因为美国后来在伊拉克、阿富汗都打仗了，外国人所产生的负面联想？这一点决定着我们的公共外交策略。

赵：美国是一个多面体，当然这个面有些顺序，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刚才我已经说了几面了，它是富有创造力的，它的民众是乐观的。但是如果问第一面是什么，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人们会首先想到：美国自己认为自己是世界的裁判者。美国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喜欢美国人，你们在替上帝做事，你们想把你们的制度推广到全世界。你知道我是物理学家出身，我只知道牛顿定律和爱因斯坦定律具有普世性。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这是成

^① 指《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和美国人》，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

问题的。你们到阿富汗去，到伊拉克去，这固然有“9·11”事件的因素，可以惩罚恐怖主义者，但是不能惩罚伊斯兰，不能改造伊斯兰，你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福：您刚才说的这些都很有道理，其实有很多观点我也赞同。我们也意识到，就美国而言，由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很多外国人认为美国是反伊斯兰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也尽力地向外界表明美国不是反伊斯兰的。再回到中国的问题，请问：当你们对外国人说起中国时，你们想到的是什么，你们又希望外国人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您认为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哪些是不对的、是您希望改变的？

赵：我可以非常直率地回答你的问题，但作为回报，你也要直率地说说你们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哪怕是不好听的话我也要听。美国的理论，或者说西方的理论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的不同，你们两党轮流执政，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一些比较小的党派来执政，于是你们说中国是独裁的，这是你们常用的词汇，有的欧洲媒体客气一点说就是“高度中央集权的”。那么最后就会说，中国是不民主、不自由的等等。实际上我认为，看中国首先要看到在历史上，特别是最近几百年以来，我们的经济、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一直到1949年，在任何国际争端中，中国都是失败的，以至于给日本的一次战争赔偿的数额相当于两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所以中国的落后是世界公认的。今天，我希望世界能认识到：中国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取得了一定成就、还存在着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每天都在变化的中国。西方应该允许中国人试验自己的政治，应当多观察，少指责，这是我希望。越对中国无理指责，我们越对你们有不好的印象，也就是认为你们是“法官”。

福：从我们国家的情况看，外界认为美国是反伊斯兰的。为了纠

正这种印象，我们就邀请了伊斯兰国家的一些神职人员到美国访问，带他们参观美国的穆斯林社区，和当地的穆斯林进行交流，他们会发现美国的穆斯林可以正常地从事伊斯兰教的活动，他们并没有受到压迫，他们就像普通的美国人一样生活。我们希望这些神职人员回到各自的国家之后，也能向当地的民众解释：“在美国，并不存在压迫伊斯兰教信徒的现象，美国不是反伊斯兰的。”这是我们在做的。就中国而言，外界认为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那么你们又采取了哪些行动来改变外国人的这种错误印象呢？您希望中国在上树立怎样的形象呢？

赵：我们的报纸、杂志和演说家不太善于讲中国的故事，而是过多地用一些社会科学名词、特别是政治名词来阐述中国。这样的表述，外国人理解起来很困难，因为外国人所受的教育，他们的政治教育、哲学教育，他们教学的词汇表与中国的词汇表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我担任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以后，深感世界对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了解几近零。所以我就确认了我的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向外界表达政治协商会议，通过这个机构来表达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民主的内容。比如说你到了我们的办公室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你知道多少？

福：您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不过因为我关注的重点是公共外交，我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实所知甚少。卢格参议员^①对中国政协比较了解。

赵：一个中国人如果不知道你们的参议院，就会被认为太无知了。一个美国人不知道中国政协，错不在你们，在于我们表达得不够。

^① 指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

中国政协是中国的—个重要的政治协商机构。它的组成是社会各界的精英，有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媒体领袖、宗教领袖、党派领袖、过去的官员和少量的现在的官员。比如说外事委员会，我的副主任中有的就是前驻美国、法国、日本大使。

执政党共产党和国务院的重大政策和重大人选在确立之前，会征求这里的意见。这里的意见，他们会尽可能地吸收。因为政协委员来自各个方面，他们代表各领域的民意，因此他们的意见很有价值。

福：政协委员是如何遴选出来的呢？

赵：这是重要的。

政协委员不是选举的，因此他对政府的政策没有否决权，只有建议权和提供修正意见的权利。某一个领域的精英人士是显而易见的，而精英人士又不能全部进入政协，于是他们协商，大家觉得这个人好，就是他。

因为委员们不是选举产生的，所以他们对政府的人选也没有投票权，只有讨论和建议的权利。他们很自然地也成为了一个最大的智囊机构。他们可以对政府的政策执行进行监督，还可以到各处去视察，通过询问政府的官员和当地的民众来评价已经实施的政策。

上次在我担任发言人的政协新闻发布会上，美国之音的记者问：政协就是一盆花吧？给大家看的吧？其实它不是一盆花，而是一个民主协商的机构。

福：如果它不是花，它又是什么呢？是个锤子？

赵：是个政治协商机构的网络。各省、市、县都有政治协商会议。

福：因为您刚才提到政协是一个很重要的协商机构，您能不能给我举一下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方面，政府吸收了政协的意见，比如政府说“我想做某—件事”，政协说“这么做不好”，然后政府从善如流，吸收了政协的意见就没有那么做。另—方面的例子，政府想这么做，

政协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政府还是一意孤行地没有接受政协的意见，照样去做了。能不能正反例子各举一个？

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美国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就设立一个委员会专门来研究这个问题，可能会花费很长时间提出一个报告，其中包含很多建议。政府有时候会接受这种报告的建议，有的时候就没有理会。这种现象在美国是很常见的。所以我想问：在中国也有这样的现象吗？

我再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美国“9·11”事件之后，成立了“9·11 调查委员会”，后来发布了一个很长的报告，里面提出了一大堆建议，最后只有少部分被政府采纳并实施了。即便如此，这个调查委员会还是会说：“你看你看，你还没有采纳我的哪些哪些建议。”也就是说，在美国，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有的可能会被采纳，有的可能政府根本就不理会。中国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

赵：举一个例子，它既采纳了一部分，又没有完全采纳。

最初，1983 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三峡水电站，1985 年政协委员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个方案不够周密，可能会引起生态问题，阻止了这个方案，阻止了 10 年。

但是在这 10 年当中，政府重新做规划，重新做设计，不断提出新的方案。10 年以后，经政协协商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通过。

政府不可能全部接受政协的提案，因为每年提出来的方案有几千个，其中受到重视的不过是几百个，最后能够起作用的大概有几十个。

福：这些建议被提出后，你们如何让公众知道政协委员提出了这些建议呢？是通过互联网或报刊、杂志的形式把这些建议的内容公布，还是通过电视采访的形式把这些建议公之于众？因为在美国，如果议员提出一些议案，他们会想方设法地让公众了解这些议案，